
葡月的错位

(二) 国民经济学的幻象与政治经济学的极化

作者：张皓翔

ORCID: 0009-0001-2997-7726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曾给出过“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他忘了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资产”与“无产”绝非国民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与“无产”，而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与“无产”。

而这场运动同时向我们传递了三个信息：

1. 马克思的那个论断是怎样在 21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以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愈演愈烈的；
2. 这一论断又如何因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野而无法被正确认识到的；
3. 当越来越多的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小生产者被抛入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无产者队伍之后，他们如何因为自身的国民经济学运动而割裂着无产阶级的统一政治意志，带来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呢？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强调过，阶级划分的标准是以“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为核心锚点。阶级差异的本质，是“对自身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实际掌控能力”，与“对他人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支配能力”的分配差异。

以这一分析框架审视当下社会结构，便可清晰辨认出资本支配形式的变化：

一位学者在庸俗经济学家的分析中显然属于中产阶级，但当这位学者被绩效深度规训，甚至连自身研究的方向也无法自主决定时，他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几乎为零。

一个连锁店店主看似占有着店铺的生产资料，但他经营的深度受到总部的指令安排。再如那些拥有高薪与技术技能的高级程序员或平台创作者，其劳动过程同样受到算法逻辑与数据接口的微观监控。

这些在工业时代是难以实现的。在十八、十九世纪，由于缺乏及时的通讯工具与互联网的大数据联网，对劳动力生产的支配，往往只能假借于对实体生产资料的占有这一中介来实现。

于是一种深度的错位与历史的盲区便出现了。马克思所处的工业时代，因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使得他们在阶级分析上无法拨开实物或物质生产资料占有的表象，去触及劳动力的核心。

因此，当我们拿起了“劳动力”的透镜，我们便会发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数字时代的到来，跨时空的即时管理与统一支配能力得以实现。资本的支配越来越不加掩饰地以对劳动力的直接支配为核心与表象的统一，于是阶级的两极分化也愈发明显。

当然，我们所说的阶级两极分化，并非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者的内部皆已实现了质与量的完全统一，并实现着完美的对立。

阶级内部质的统一固然已经实现，皆为“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系统性丧失的群体。但阶级内部必然且必须存在着量的差异。

“必然”是由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划分越来越只能依据其核心的根本差异——即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物质条件的充盈，决定了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形式的多样，是历史的必然。

“必须”则是因为无产阶级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个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量上的区别是必然的趋势，也正是无产阶级所追求的解放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行将多样的独特的人化为一一致的，是一种“要素化”的表现，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悖逆之举。

因此，阶级的两极分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预设，更是一个已经开始且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历史进程。只不过历史绝不会像那些庸俗教条主义者所设想那样，为他们展开一幅洁净纯粹、充满理想主义、毋宁说是空想主义色彩的如铁板一块的无产阶级整体，或者说质与量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整体。

同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以国民经济学为代表的学者与理论家总喜欢用“中产阶级扩大论”、“无产阶级消亡论”、“技术技能资本化”等狂言妄语来宣称马克思的两极对立论的过时。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因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他们对阶级的本质差异及其外化的划分标准，不可避免地浮于了实体法权占有的表象，而未能触及劳动力在阶级差异的本质核心地位——至少他们未能清晰地、系统地去论证——从而给了这群跃跃狂徒留出了叫嚣的空子。这一群资产阶级的学者错将——毋宁说是故意——将马克思因历史局限而聚焦于实体生产资料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歪曲为形而上学的法权占有论，与国民经济学去接轨，以支持他们那些漏洞百出的“中产阶级扩大论”。而也正是这一群资产阶级的学者在大肆炫耀，以至于我们在长期以来竟真的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消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也随之被缓和，剩下的是劳资矛盾，剩下的是可以通过高福利、高待遇去调和的矛盾。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狼子野心。

当越来越多在国民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上将自身认同为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高人一等的群体，在政治经济学上被抛入了无产者的队伍时，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气息便极大地影响着整个无产阶级队伍。

必须明确的是，这里的小资产阶级气息并不指他们过着一个相对充盈的物质生活——喝咖啡、吃饱饭——这些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气息，而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物质充盈。教条主义者常常将这些误归为享乐主义，并以此指责无产阶级队伍，这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相反，最核心的小资产阶级气息，在于政治与经济上的妥协、摇摆与不坚定，在于利益上的个人主义崇拜，以及对集中纪律与统一意志的本能抵触。这种习气在当下的斗争中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革命政党与统一纪律的盲目排斥，将其降维为无政府主义式的自发崇拜。在这次以法国为核心的动荡中，参与者普遍展现出一种对集中领导与组织纪律的狂热警惕，企图用原子化的自发联结去对抗高度组织化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导致运动极易陷入无方向的空耗。这当然具有其社会条件与历史背景，但这并不能成为为他们开脱罪责的免责声明。

第二，是他们完成了第一步的联结——基于爱好与身份认同的联结，但没有完成第二步同阶级地基的联结。他们排斥联合最广大、最具有力量的产业劳动者群体，无法真正地与他们联合在一起，无法将自身边缘化的群体性身份认同诉求，同核心的、根本的阶级利益诉求联系起来。他们的斗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以爱好和身份认同为引力机制的联合，而非阶级利益的联合，甚至许多斗争在最后演变为了一种彰显个性的文化表演，而非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从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21 世纪的阶级斗争确实面临着 19 世纪共产国际与工人运动所未曾遭遇过的全新难题与机遇。

它的机遇在于，在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层面上，随着资本对劳动力生产支配的不断深入，阶级矛盾与两极对立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深刻、更加尖锐。学生群体作为革命的前哨，再一次在欧洲的土地上率先点燃了斗争的火焰，展现了其作为解放意识初期点燃者的历史地位。

但它的难题则更为严峻，并在这次运动中集中爆发了出来：这就是“如何从以爱好、身份

认同与个体特性为核心的联结机制，重新跨越并迈回到共同的阶级地基之上”。这种以个体特性和精神需要为圆心的新联结，本身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标志着生产力发展使人类获得了余裕去追求本我的展开与个性的释放。然而，它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深刻难题：当这种联结仅仅停留在私人的、审美的、身份认同的圈子里，而无法将其推进到第二步——即同客观的阶级利益地基实现重新统一时，它就只能沦为物质大解放所撒下的一点点残羹冷炙，甚至被资本的商品化逻辑所收编。

在这次运动中，这一难题彻底爆发了：学生及边缘群体虽然完成了基于身份与诉求的第一步联结，但由于缺乏将这种联结导向阶级地基的自觉机制，导致整场运动在缺少科学纲领、缺乏统一政治意志、未能同广大产业劳动者建立有机联系的情况下，最终呈现出一种形式上高度激进、内核上却依然保守与自发的“错位”形态。